

近五十年來的文天祥研究 (1957~2007)：回顧與討論

蔡佳琳*

自元代以降，文天祥的歷史地位便不斷上升，其忠烈的形象更成為明清士人追尋的典範。清末民初時，在國族建構與民族集體記憶的形塑過程中，文天祥逐漸與「民族英雄」劃上等號。近半個世紀以來，學界對於文天祥的研究仍是以清末民初以來的「民族英雄」形象為基礎，希望透過文氏的生平研究彰顯其氣節，更藉其事蹟達到鼓舞民心與推行愛國教育之目的。此外，由於意識型態的影響，中國學界十分重視文天祥的家世背景以及歷史評價問題，但這些帶有目的性的研究課題，對於文天祥研究的拓展並無太大的助益，反而凸顯了歷史與歷史教育為政治服務的一面。

由於既有研究框架的限制、時代氣氛的轉變，以及新史料的發掘有限，使相關研究數量看似豐富，但創見卻相當有限。因此，近年來相關研究的焦點多在於考辨史事與詩詞研究，關於文天祥的生平研究，仍能突破之處已十分有限。相反的，從元代至現代，文天祥的事蹟及形象是如何被傳播與建立、近代以來文天祥又如何與「民族英雄」形象劃上等號，這些都是過去學者較少關注的課題，也是未來可加以拓展之領域。

關鍵詞：文天祥、形象、人物研究、民族英雄、愛國教育

*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班

壹、前言

文天祥（1236-1283），字履善，又字宋瑞，號文山，南宋江西廬陵（今江西省吉安縣）人。元代以來，文天祥便以忠烈形象深植於士人心中，他至死不屈的忠節表現甚至逐漸成為一種「典範」。清末民初，在國族建構與民族集體記憶的形塑過程中，文天祥又逐漸與「民族精神表率」、「民族英雄」劃上等號，而他的詩文如〈過零丁洋〉、〈正氣歌〉等，不但被視為展現愛國精神與民族氣節的作品，並屢屢成為中學的教材。到了 1930 年代，由於對日戰爭的需要，不論在報章雜誌或學術期刊上更是時常刊登文天祥的傳記，以期鼓舞民心、激發民族精神。¹ 直至今日，一般人所認識、理解的文天祥，仍是延續清末民初以來所定位的「民族英雄」形象，不僅如此，這樣的形象更深刻地影響到文天祥的相關研究成果。

雖然文天祥是當代家喻戶曉的人物，相關研究成果數量也十分豐碩，然而卻始終沒有學者對文天祥研究做過介紹，殊為可惜。由於相關論著數量龐雜，筆者能力有限，勢難蒐羅盡全，加以多數文章的內容大同小異，創見有限，因此，本文擬僅針對文天祥研究中幾個常見的課題，並就筆者所見近五十年之相關論文與專書進行回顧與討論，希望能由此瞭解文天祥研究的發展趨勢

¹ 關於清末民初到中日戰爭時期士人對文天祥之論述可參見沈松橋，〈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3（2000.6），頁 117 至 118；William A. Brown, *Wen T'ien-hsiang: A biographical study of a Sung patriot* (San Francisco: Chinese Materials Center Publication, 1986), pp. 57-60。然而，關於這段時期文天祥的歷史地位與過去相較有何改變，目前仍尚未有專論出現。

與侷限，進而對思考未來可以擴展之課題有所裨益。

貳、文天祥傳記生平之研究

文天祥研究主要運用的史料有文天祥的著作，如《紀年錄》、《指南錄》、《指南後錄》、《集杜詩》等。此外，後人所撰的文天祥傳記，如宋人鄧光薦（1232-1303）〈文丞相傳〉、元人劉岳申（1260-1346）〈文丞相傳〉、官修史書《宋史·文天祥傳》、明人胡廣（1370-1418）〈丞相傳〉、陳邦瞻（?-1623）《宋史記事本末》等，亦是此課題所運用的基本史料。然而，由於史料拓展有限，加上當代「民族英雄」框架的限制，中文學界關於文天祥生平之研究，內容多大同小異，主要圍繞在文天祥的「民族氣節」、「愛國思想」等問題上。

在台灣，1950年代至70年代是文天祥相關研究成果最多的時期。此時受到時代氛圍的影響，台灣對於「民族英雄」的研究十分熱絡，而文天祥自然也成為民族精神教育的最佳典範之一。在這種「反攻」的氛圍之下，1956年世界書局將文天祥的《文文山全集》與鄭思肖（1241-1318）的《鐵函心史》、朱舜水（1600-1682）的《舜水遺書》合編出版《民族正氣叢書》第一輯，其目的不言可喻。此時發表的相關論文雖不少，然多半仍是以鼓舞民族氣節、「反攻大陸」為目標，學術研究專論的作品卻不多。²

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李安《文天祥史蹟考》。³作者詳

² 如胡篤重，〈我們應如何崇拜文天祥〉，《反攻》，113（1954），頁5-6；陳彰，〈民族英雄文天祥〉，《江西文獻》，77（1974），頁25-28；林宗霖，〈代表民族正氣的文天祥〉，《勵進》，376（1977），頁29-33；周仲超，〈中華國魂贛人楷模—文信國公〉，《江西文獻》，92（1978），頁18-22。

³ 李安，《文天祥史蹟考》（台北：正中書局，1972）。

細耙梳各種相關史料，依文天祥的身世、故里、生平事蹟，以及軼事、手跡等進行詳盡敘述與考證。本書運用的材料雖與前人無太大的差異，但作者大量蒐集文天祥的手跡、遺物與紀念照片，並親自尋訪在台灣的江西籍人士，以及獲得時居美國的文天祥後人之協助，讓書中文天祥相關之史蹟的考註更加具有說服力。因此，雖然本書的寫作動機仍基於「弘揚民族精神，力求反攻必勝」⁴的想法，但在保留與發掘史料上的貢獻，仍有益於後人之研究。較為可惜的是，本書以考釋為中心，對文天祥事蹟的分析則較少，且書中對於明清朝廷對文天祥的尊崇與紀念活動的描述有些語焉不詳，⁵唯仍無損本書的價值。此後，作者李安陸續以本書與其長期研究的成果為基礎，在各類期刊上發表與文天祥相關之論文。⁶

1980 年代以後，或許由於「反攻」的目的已漸漸消失，台灣對於「民族英雄」的研究也不再如過去熱絡。值得注意的是，在台灣學界逐漸失去對文天祥研究的興趣之時，反而是中國學界開始對他產生高度關注的時期。與台灣類似，多數關於文天祥生平

⁴ 李安，《文天祥史蹟考》，〈自序〉。

⁵ 如書中在〈例言〉與第十四章，〈年表〉中均提及文天祥於明景泰年間追諡為「忠烈」且從祀文廟。然而實際上，文天祥直到清道光年間才從祀文廟，作者的寫法容易引起誤解。見李安，《文天祥史蹟考》，〈例言〉，頁 1；〈年表〉，頁 210。

⁶ 李安在這段時間於期刊上發表的論文有〈文天祥歷任官職考〉，《東方雜誌》，5：8（1972），頁 64-69；〈文天祥玉帶生硯〉，《東方雜誌》，5：11（1972），頁 68-69；〈岳飛和文天祥的史事研究〉，《新時代》，12：10（1972），頁 28-34；〈文天祥生平的快愉時代〉，《今日中國》，35（1974），頁 98-102；〈文天祥被執與成仁所在地的紀念亭記〉，《新萬象》，5（1976），頁 46-50。這些文章的內容與《文天祥史蹟考》差異不大。

傳略的研究，主要仍是探討文天祥的人格特質、愛國思想。⁷其立論與角度也都未脫前人研究的範疇，目的仍是藉此凸顯文天祥的完人特質以及激發民族精神。

1980 年代以降，在中國學界共有 3 本較具代表性的文天祥傳記問世。分別是萬繩楠《文天祥》、⁸楊正典《文天祥的生平和思想》⁹以及修曉波《文天祥評傳》。¹⁰三位作者對於文天祥的生平事蹟部分，看法並未與前人有太大不同，也都以「民族英雄」的角度看待文天祥。唯一較大的差異在於三人對於文天祥的哲學思想各有不同的看法。如萬繩楠將理學視為宋代政治的阻礙，因此在探討文天祥的思想時，刻意強調文天祥思想與《周易》的關係，並以此企圖撇清文天祥與理學之關聯。¹¹楊正典的觀點雖與萬繩楠有所不同，但仍認為文天祥思想與宋代理學無關，而是唯物論的思想。¹²至於修曉波則回應上述兩位作者，認為不需撇清文天祥與理學的關係，也不需刻意將文天祥的思想與唯物主義相連結，強調文天祥的歷史地位並不會因他是否接受理學思想與他是否為唯物論者而產生改變。¹³

日本學者梅原郁在撰寫《文天祥》一書時曾提到，雖然隨著時間的演進，文天祥的歷史地位不斷上升，成為士大夫崇敬的對

⁷ 其中，愛國思想的部分與中國的愛國教育有很大的關係，見本文第四部分的討論。

⁸ 萬繩楠，《文天祥》（台北：知書房，1999）。本書原為 1985 年由河南人民出版社發行的《文天祥傳》，後經過增訂，由知書房發行繁體中文版。

⁹ 楊正典，《文天祥的生平和思想》（濟南：齊魯書社，1992）。

¹⁰ 修曉波，《文天祥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2）。

¹¹ 萬繩楠，《文天祥》，頁 301-311。

¹² 楊正典，《文天祥的生平和思想》，頁 104-105。

¹³ 修曉波，《文天祥評傳》，頁 28-29。

象，然而由於他的形象集中在「忠義」之上，因此一個身為「人」的文天祥便被忽略了。¹⁴同樣的，到了現代，由於學者多將文天祥的形象定位於「民族英雄」上，因此，多數的論著對於文天祥的理解與研究，基本上都不脫民族英雄的框架，甚至將文天祥視為完人，而這自然也造成了文天祥研究的侷限。

相對於一般研究著重的民族氣節與愛國思想，西方學者由於不受民族英雄光環的制約，反而能提出更多元的想法。戴仁柱（Richard L. Davis）在其關於宋代歷史研究的名著《山下有風：十三世紀中國政治與文化危機》中，文天祥可說是貫穿全書的主要人物之一。作者認為，由於北宋的重文輕武與南方較富裕的物質環境，使南宋充滿了柔弱氣質。因此辛棄疾（1140-1207）、陸游（1125-1210）、楊萬里（1127-1206）等南宋文人都試圖在他們的詩文中扭轉宋代的文弱風氣，而文天祥不僅從詩文，更從行動上表達出陽剛之氣。文天祥被俘後，面對元人能始終展現不屈的氣節，甚至最後殉難，正是文天祥企圖扭轉南宋的文弱之氣所做的具體表現。¹⁵同樣是論述文天祥的生平，作者更加重視南宋的政治環境對士人抉擇帶來的影響，也使得作者在描寫文天祥時更加生動、引人入勝。田浩（Hoyt C. Tillman）則從蒙古入侵對士人造

¹⁴ 梅原郁，《文天祥》（東京：人物往來社，1966），頁 298-301。因此，作者便特別強調，他在書中排除了後世對於文天祥的評價，如「忠義」、「愛國」、「抵抗的英雄」等，單純將文天祥視為一個南宋末年的士人進行研究。

¹⁵ Richard L. Davis, *Wind against the mountain: the crisis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中譯本見劉曉譯，《十三世紀中國政治與文化危機》（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3），關於文天祥的行動在全書中不斷被提及，其中第五章更是以文天祥貫穿全章，見頁 199-259。

成之心裡創傷的角度看待南宋末年士人各種表達哀痛的反應。在文中，作者舉出許多個案作為研究對象，其中文天祥亦是一個重要的代表。作者分析文天祥的詩文，並提出以下的假設：雖然文天祥的詩文與關於他的文字都描繪了一個英勇的大丈夫形象，然而，在某些地方仍暗示著他的精神狀態與情感並非如此受到控制，但為了激勵人們回到宋以前那種尚武、自律的文化典範，這樣的動力使得文天祥最終仍然超越了創傷留下歷史聲名。¹⁶在這個看法上，作者與戴仁柱有著類似的論點。

或許由於新史料發掘有限，可拓展的領域受到限制，不論是台灣或是中國大陸，近二十年來的文天祥相關研究最常見的課題便是分析其文學成就，¹⁷如張公鑑《文天祥生平及其詩詞研究》便是針對文天祥的生平思想及詩詞文學作綜合研究。作者考訂《文山全集》的版本，然後將文天祥的詩詞加以分期、評析，兼述其風格、形式，並與文天祥生平事蹟相印證，其主要目的在重估文天祥應有的文學地位。¹⁸雖然本書目的主要為文學分析，但作者以一章的篇幅分析文天祥的交遊與其思想的關聯，對於過去文天祥研究較少觸及的交遊情況，本書或可為相關研究的補充。近年來，劉華民對於文天祥的文學成就與詩文分析也有十分豐碩的成果，如探討文天祥的詩學觀、評論文天祥早期詩詞的文學表現、

¹⁶ 田浩，〈因「亂」而致的心理創傷：漢族士人對蒙古入侵回應之研究〉，《臺大文史哲學報》，58（2003.5），頁71-94。

¹⁷ 以中國為例，根據統計，近二十年來有關文天祥研究的論文之中，詩文類的研究佔了總數的46.93%。見傅林紅、羅紅，〈1979-2006年文天祥研究論文定量分析〉，《井岡山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8：11（2007.11），頁28。

¹⁸ 張公鑑，《文天祥生平及其詩詞研究》（台北：台灣商務，1989）。本書為作者在中國文化大學中文研究所的碩士論文（1985年），同時也是目前台灣唯一以文天祥為研究對象的學位論文。

分析《指南錄》《指南後錄》的異同，以及探究文天祥詩的藝術性等。¹⁹除了從詩文的表現理解文天祥的思想與性格外，劉氏也十分重視文天祥的詩文所展現的藝術性。此外，如陳貴麟討論《集杜詩》的地位與價值、²⁰李燕新評論文天祥之詞，²¹更多的文章是基於教學之用，討論〈正氣歌〉文學價值與精神。但不論是強調民族正氣的傳記研究，或是考察詩文表現的文學研究，對於文天祥形象的定位則是沒有太大的改變。

參、生平事蹟考辨：對《宋史·文天祥傳》的質疑

長期以來，《宋史·文天祥傳》的正確性便屢受爭議，因此，文天祥的相關研究多會先觸及對《宋史·文天祥傳》的質疑。對於《宋史·文天祥傳》的質疑，主要集中在三個問題上：一是文天祥的籍貫，二是文天祥的家世，三是文天祥被囚於大都時，是否有「黃冠歸故鄉」，即以道士身份歸隱的念頭。這三個問題，特別是第一點與第三點，都從明清時期便不斷受士人所質疑。

¹⁹ 分別見劉華民，〈文天祥詩學觀初探〉，《常熟高專學報》，2（1996），頁 26-33；〈論文天祥前期詩〉，《常熟高專學報》，3（1997），頁 28-34；〈文天祥《指南錄》《指南後錄》之異同〉，《南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9：3（1998.9），頁 98-101；〈文天祥詩藝術創新論略〉，《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2001.1），頁 84-87。根據統計，劉華民為 1980 年代以來，中國學界發表關於文天祥研究論文數量最多的學者（共 14 篇），其中多數是詩文分析與史料考辨。見傅林紅、羅紅，〈1979-2006 年文天祥研究論文定量分析〉，頁 30。

²⁰ 陳貴麟，〈論文天祥集杜詩的關鍵地位與作品價值〉，《中國學術年刊》，9（1987.6），頁 142-166。

²¹ 李燕新，〈文文山詞述評〉，《問學》，3（1990.7），頁 175-197。

首先，關於文天祥籍貫的問題。爭議源於《宋史》中記載文天祥為「吉之吉水人」，然而，從後人如鄭思肖、劉岳申、胡廣、羅洪先等人所撰的文天祥傳記或祠堂記中均記載文天祥為廬陵人。因此，究竟文天祥是吉水人或是廬陵人，從元代以後便屢有爭議，兩種說法均存在各種文天祥傳記中。²²因此，針對文天祥的故里問題，兩岸的學者皆有不少相關研究。²³然而，這些研究的結論並無不同，均指出文天祥的出生地為廬陵縣淳化鄉的富田村。

其次，關於文天祥的家世問題，主要為中國大陸學界所關切。在《宋史·文天祥傳》中有「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的描述，對於將文天祥視為英雄與完人的研究者而

²² 知道光《吉水縣志》在編纂時也發現這種記載不清的狀態，其中舊志裡關於文天祥的籍貫更是兩者並存。不過最後方志的編者選擇採用《宋史》的記載，見知道光《吉水縣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據道光五年刊本影印），卷22，〈名臣〉，總頁1012-1014。關於文天祥籍貫的爭議在民國二十四年時更浮上檯面。當時江西省政府教育廳為了訓練民眾而編寫教本，但教本中將文天祥記載為吉水人。當時，吉安縣（廬陵縣改名）的士紳為了此事，便數度聯名向省政府及中央陳情，並列舉歷代可以證明文天祥為廬陵人之記載，希望能夠更正文天祥的籍貫。見蕭廉韶輯，《吉安螺山宋文丞相祠志》，收入《中國祠墓志叢刊》第30輯（揚州：廣陵書社，2004），頁211-254。由此可見，雖然文天祥為廬陵人應是確定之事，然而由於《宋史》記載的影響，使得文天祥的籍貫問題屢屢成為爭議。

²³ 見李安，《文天祥史蹟考》，頁15-16；林逸，〈文天祥故里的爭議〉，《書目季刊》，14：3（1980.12），頁43-46；黃長椿，〈《宋史文天祥傳》考辨〉，江西歷史學會編，《浩然正氣—文天祥逝世七百週年紀念》（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頁121-124；劉文源，〈文天祥家世考〉，《浩然正氣—文天祥逝世七百週年紀念》，頁245-269；曾采堂，〈文天祥籍貫考證〉，《宋史研究通訊》，7（1986.9），頁3-6；孫醒，〈文天祥籍貫考〉，《史學月刊》，6（1989.11），頁30-33；修曉波，《文天祥評傳》，頁3-4。其中劉文源在文章中對於文天祥先世的遷徙過程也有一番考察。

言，這樣的記載往往令人心生疑義，特別是對階級問題極為敏感的中國大陸學界，更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因此，不少學者便試圖從其他士人所撰的文天祥傳記中證明此為《宋史》的謬誤。如萬繩楠在《文天祥》一書費了不少篇幅證明文天祥的家族沒有顯赫家世，文天祥更不是一個奢華之人。²⁴針對萬繩楠等人的看法，戴仁柱認為萬氏所提供的史料太少，且說服力不足。戴仁柱指出，文天祥或許不渴求財富，但從他從小便具備的文學素養，以及屢屢捐出自己的財富幫助朝廷，可知文天祥的家世應與一般宋代士人一樣，屬於「中等社會階層」。²⁵而修曉波則提出一則史料表明文天祥在入仕之後，經濟情況確實獲得不少改善，《宋史》所言未必全然是錯的。更重要的是，文天祥獲得後人的崇敬與他是否出生庶民家庭以及前半生生活是否儉約並無關聯。²⁶

第三，文天祥在大都獄中時，王積翁（1229-1284）曾為文天祥說情，以及道士靈陽子曾到獄中為文氏講道。因此，在《宋史·文天祥傳》有一段極具爭議性的記載：「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文天祥是否曾想「黃冠歸故鄉」，關於這點，在明清士人的文集中也屢屢質疑其真實性，甚至認為這是元朝對文天祥地位的刻意貶低。今人研究也多認為此說不可信。如黃長椿以

²⁴ 萬繩楠，《文天祥》，頁 21-22。有著同樣看法的學者尚有黃長椿，〈《宋史文天祥傳》考辨〉，《浩然正氣》，頁 124-127；楊正典，〈《宋史文天祥傳》辨正〉，《文獻》，3（1986.7），頁 78-87；劉華民，〈《宋史·文天祥傳》的質疑〉，《吉安師專學報（哲學社會科學）》，17：1（1996.3），頁 7-12。然而，在台灣面對《宋史》這段記載，卻未有太多討論，李安認為這記載表明文天祥歸隱文山時的閒適之樂。見李安，《文天祥史蹟考》，頁 88。

²⁵ 戴仁柱著、劉曉譯，《十三世紀中國政治與文化危機》，頁 199-200。

²⁶ 修曉波，《文天祥評傳》，頁 112-113。

後人所撰的文天祥傳記均無此記載，認定《宋史》這段記載不可信，並認為這是《宋史》對文天祥的誣貶；²⁷劉華民在〈《宋史·文天祥傳》的質疑〉更花了一半以上的篇幅駁斥「黃冠歸故鄉」一事的真實性，並認為《宋史》對文天祥的記載簡略失實。²⁸修曉波同樣認為這個記載並不可信，然而，與其他論者不同的是，他認為這種說法的出現並非空穴來風。在文天祥的思想中仍同意佛道之說，特別是在「死生之際」，這種「超灑忘世」的想法會更加強烈，當靈陽子前來為文天祥講道時，其實是引起了文天祥的共鳴。因此，修氏認為之所以會有「黃冠歸故鄉」的記載，或許是當時訛傳下的產物，而非元人刻意貶低文天祥。²⁹

關於《宋史·文天祥傳》的質疑除了對文天祥的生平事蹟進行考辨外，也涉及到文天祥的評價問題。過去論者常以《宋史·文天祥傳》中的謬誤認定為元代統治者刻意貶抑文天祥的地位，但 William A. Brown 則認為《宋史·文天祥傳》雖有錯誤，卻不能說是元代統治者刻意为之。相反的，《宋史·文天祥傳》中對於文天祥的讚美反而值得注意。因此，他關注《宋史·文天祥傳》的編纂者，發覺其中有許多人都是儒家士大夫，而他們的先祖也往往曾在宋朝任官，而其中身為編纂者之一的歐陽玄（1272-1357），其先世原先居住在廬陵。Brown 從歐陽玄的文集中發現，或許歐陽玄在編纂以及確立文天祥在《宋史》的高評價中扮

²⁷ 黃長椿，〈《宋史文天祥傳》考辨〉，頁 127-129。

²⁸ 劉華民，〈《宋史·文天祥傳》的質疑〉，頁 7-12。

²⁹ 修曉波，《文天祥評傳》，頁 267-273。同樣都認為文天祥受佛道影響深，但劉華民卻提出完全不同的意見，劉氏認為正因為佛道思想的影響，使文天祥超脫生死與個人榮辱，以更曠達的心境面對殉國死節。且從文天祥的詩句中可以發現其不願黃冠遁世、方外隱居。見劉華民，〈《宋史·文天祥傳》的質疑〉，頁 11-12。

演重要的角色。³⁰

除了考辨《宋史》的記載外，也有學者針對文天祥的家譜以及新發現的佚文進行考察與介紹。如鄭良樹注意到文天祥的家族與族譜，透過各種後人所撰的文天祥傳、地方志與時任馬來西亞大學地理系副教授文平強所藏的《文氏族譜》相互對照，發覺兩者相合的程度極高，因此推斷此族譜為真，並利用此族譜了解文天祥家族的事蹟。³¹這對探討文天祥家族的遷徙與發展有極大的貢獻。此外，中國近三年來曾發現兩件文天祥的佚文，一件是〈吉水莆陽王先生傳〉，另一件為〈題洪氏像跋〉。杜九香與陳學文分別針對兩篇佚文進行分析與介紹，前者被視為能填補文天祥在咸淳八年活動的空白；後者則可看出文天祥對宗譜的看法。³²

肆、歷史地位與評價問題

關於文天祥的歷史地位與評價之研究，可以區分為兩種類型，一是研究文天祥死後數百年間歷史地位與評價的變化，一是針對文天祥的行為與思想進行定位與評價。前者目前的相關研究不多，仍有值得拓展、開發之處，而後者往往有其為政治服務的目的，學術研究的價值便十分有限。

³⁰ William A. Brown, *Wen T'ien-hsiang: A biographical study of a Sung patriot*, pp. 82-88.

³¹ 鄭良樹，〈文信國公族譜〉，《故宮季刊》，14：3（1980）頁 53-67、〈信國公之家族及其事蹟〉，《大陸雜誌》，60：6（1980.6），頁 19-24。

³² 杜九香，〈新發現的文天祥自撰珍貴史料研究〉，《江西社會科學》，3（2003.3），頁 176；陳學文，〈新發現的文天祥一篇佚文〉，《天中學刊》，20：6（2005.6）。

一、歷史地位與形象研究

關於文天祥在明清以降的歷史地位與形象之研究，目前還未有專論問世，多半是散見於各種文天祥傳記中。內容大致上包括了明清時統治者對文天祥的表彰、文天祥祠的設立、文文山集的刊行與流傳等。³³在這些論著中多是基於凸顯文天祥的「浩氣長存」而論述明清之後的發展，因此多是屬於概述性的文字，介紹遠多於分析。不過，已有學者指出，文天祥的歷史地位與評價不斷地上升，與明清朝廷與士人所提倡的儒家思想，特別是忠君思想息息相關。如萬繩楠指出，明人之所以熱中於為文天祥建祠，寫祠記，主要是為了強化忠君思想，將文天祥當作加強專制統治的工具，因此，萬氏認為明清統治者只是片面抓住文天祥說過的「忠」與「義」，而忽略了文天祥思想中更深刻的內涵。³⁴

相對於中文學界對文天祥歷史地位與評價演變的讚揚與激情，西方學者則是以比較冷靜、客觀的態度探討文天祥地位的演變。如 William A. Brown 概略性地分析從元代至 1980 年代文天祥歷史地位的變化以及不同時代對於文天祥的不同看法。Brown 認為，隨著時代的演變，文天祥的歷史地位不斷上升，而且在不同的時代，由於時代氛圍的不同，對於文天祥的定位也有差異。特

³³ 可參見李安，《文天祥史蹟考》；賴功歐，〈評價和影響〉，《民族英雄與愛國詩人文天祥》（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頁 93-104；黃玉笙，《文天祥評傳》（台北：黎明，1987），頁 276-278；霍必烈，〈文天祥永垂不朽〉，《文天祥傳》（台北：國際文化，1989），頁 97-106；萬繩楠，〈關於文天祥的傳記與祠祀〉，《文天祥》，頁 391-402；修曉波，〈浩氣長存〉，《文天祥評傳》，頁 318-358 等。其中，修曉波對明清時期文天祥的紀念活動之介紹是目前筆者所見相關研究中最具體且豐富的。但可惜的是，修氏僅作介紹而未有相關分析。

³⁴ 萬繩楠，《文天祥》，頁 391-402。

別是 Brown 已隱約地觀察到近代文天祥的形象漸漸從「忠臣」轉變為「國魂」的過程，³⁵只可惜關於這方面並沒有太多著墨。不過，Brown 的觀點仍有幾個地方值得商榷。如他認為清朝由於是外族政權，因此面對同是抵抗外族的文天祥，雖然仍舊推崇，但最初的兩百年似乎並未有官方的紀念活動，直到清末為了抵抗西方勢力的入侵，才給予同是抵抗外族的文天祥極高評價，並同意其從祀孔廟。³⁶ Brown 的觀察雖大體合實有據，但清初時對於文天祥並非沒有官方紀念活動。雍正帝剛即位時（康熙六十一年年末），便議決增加四十位歷代功臣從祀帝王廟，而文天祥便是其中之一。³⁷因此，雖然清中葉以前對於文天祥的崇祀不及明代來得盛大，但是從文天祥從祀帝王廟的情況可知，即便在清初，清廷仍是將文天祥定位「忠臣」而非注意其抵抗蒙古的形象。

除了 Brown 以外，Horst W. Huber 藉由三位與文天祥相關宋遺民—王炎午（1252-1324）、謝翱（1249-1295）、鄭思肖對文天祥的頌讚來看待文天祥殉難英雄形象的形成。文天祥的殉難成就了儒家傳統，同時，透過王炎午等三位宋遺民對文天祥的書寫以及傳播，也成就了文天祥英雄形象的形成，而文天祥形象也影響

³⁵ 在分析民國時期的文天祥歷史地位時，他提到當時為了對抗日本，將同樣是抵抗外族的文天祥視為「國魂」的代表。同時，Brown 在書中表示，當他在 1984 年到福建師範大學時，發覺其中兩個學院對於文天祥的評價不太相同，一個學院稱他為對抗蒙古的民族英雄，另一個學院則稱忽略民族問題，稱他為歷史的英雄。Brown 認為這是由於中國對於蒙古在中國歷史上的定位有關。Brown 雖然已經注意到這種現象，不過在其著作中並未對此有太多著墨。見 William A. Brown, *Wen T'ien-hsiang: A biographical study of a Sung patriot*, p. 62.

³⁶ William A. Brown, *Wen T'ien-hsiang: A biographical study of a Sung patriot*, pp. 55-56.

³⁷ 《清世宗實錄》，卷 2，〈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條。

了明清之際的殉國士人，如黃道周（1585-1646）與劉宗周（1578-1645）等人。³⁸Brown 與 Huebr 的研究雖然距今都超過了二十年，不過他們對於後人有關文天祥的書寫與形象傳播之間的關聯之分析，仍是現今中文學界所缺乏的。因此，直至今日，他們的論點仍十分具有參考價值。

二、評價問題

如前所述，當代對於文天祥的評價已定位為「民族英雄」，直至今日，不論是台灣或是中國學界均是以肯定文天祥的「民族英雄」地位為基礎。然而，在十分重視歷史人物評價的中國史學界，有關文天祥的評價問題，曾經有過相當多的爭議與討論，而這也影響了文天祥研究的選題與方向。

在 1980 年代前後，對於身為「封建朝廷」服務的文天祥是否該被如此尊崇與稱之為民族英雄有不少爭論。當時，陳清泉面對這種批評便以〈關於文天祥評價的幾個問題〉一文作為回應。他認為雖然過去史學家對於文天祥確有過度溢美之辭，然而仍應肯定他的民族氣節。³⁹此後，在 1983 年時，《北京晚報》與《民族團結》上各有一篇批評岳飛、文天祥與史可法等人不該被稱為民族英雄的文章，⁴⁰由此開啟了中國學界捍衛文天祥「民族英雄」

³⁸ Horst W. Huber, "The Hero as the Spiritual Legacy of his Culture: Wen T'ien—hsiang and his Admirers," *Analecta Husserliana* 21 (Boston: Kluwer Boston, 1986), pp. 309-336. 與 William A. Brown 一樣，Huber 也以文天祥為研究對象撰寫其博士論文：*Wen T'ien Hsiang (1236-1283): Vorstufen zum Verständnis seines Lebens*, Ph.D. University of Munich, 1983. 但 Huber 的博士論文是以德文寫作，由於筆者不諳德文，因此無法對該學位論文進行回顧。

³⁹ 陳清泉，〈關於文天祥評價的幾個問題〉，《北京師院學報》，30（1980.3），頁 60-67。

⁴⁰ 關於當時《北京晚報》與《民族團結》的討論要點，見孫自誠，〈民族英雄及

地位的討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 1983 年 10 月，江西歷史學會為了紀念文天祥逝世七百週年而在江西南昌召開的學術研討會。與會學者來自中國各地，會議中發表了四十餘篇論文，爾後從中選取二十一篇論文編輯出版《浩然正氣—文天祥逝世七百週年紀念》一書。在本書所收入的二十一篇文章中，討論文天祥的「愛國主義」、「愛國思想」、是否為「民族英雄」以及該如何評價文天祥的文章就佔了 10 篇以上。在中國到底需不需要民族英雄、文天祥該不該被稱為民族英雄等問題上，這些論文都表達了肯定之意。根據統計，中國學界對於文天祥的研究以 1983 年為最高峰，⁴¹這與此時的「民族英雄」論爭應有極大關聯。然而，在肯定文天祥為民族英雄的背後也有著與台灣相似的理由，這是為了進行愛國主義教育。⁴²大體上，隨著學界透過研究的肯定以及經過中共中央推行愛國教育的宣傳，文天祥的民族英雄地位再度獲得確立，此後的研究也大多沿著此一脈絡進行至今。

然而，關於文天祥是否為民族英雄一事，在 2002 年左右再度激起波濤。是年，中共教育部頒佈的《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歷史教學大綱》（試驗修訂版）中，認為岳飛、文天祥不應再被稱為民族英雄，僅稱之為「傑出人物」即可，此事引起輿論極大的討論與批評，同時也出現了不少捍衛岳飛與文天祥歷史地位的論文。⁴³不過，無論是 1980 年代或是數年前的論爭，對於中國大陸

其他》，《浩然正氣—文天祥逝世七百週年紀念》，頁 178-179。

⁴¹ 傅林紅、羅紅，〈1979-2006 年文天祥研究論文定量分析〉，頁 28。

⁴² 江西歷史學會編，〈後記〉，《浩然正氣—文天祥逝世七百週年紀念》，頁 308。此外，在本書各篇論文中也屢屢看見這些字句。

⁴³ 這段時期撰文捍衛岳、文二民族英雄地位的文章不少，然而，多數文章均非歷史學者的著作，僅有少數是由宋史研究者所撰，如王曾瑜，〈岳飛、文天祥不該稱為民族英雄嗎？〉，《北京時報》，參見 <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

文天祥研究的拓展並無太大的助益，反而因此凸顯長期以來歷史與歷史教育為政治服務的一面。

伍、結語

由本文的討論可知，兩岸學者對於文天祥的研究仍是以清末民初以來的「民族英雄」形象為基礎，多是希望藉由文天祥的事蹟達到鼓舞民族氣節與推行愛國教育之目的。此外，如果扣除民族精神研究的要素，也可以發現兩岸學者的文天祥研究往往將焦點集中在考辨史實，特別是針對《宋史·文天祥傳》中長期受人質疑之處。雖然這對考訂文天祥的生平事蹟有極大的貢獻，然而卻往往囿於其「民族英雄」的光環與材料擴展的限制，使得相關研究看似豐富，創見卻不多，甚至只淪於統治者宣傳民族主義與愛國思想的工具而已。同時，兩岸學界的研究與西方學界往往缺乏對話，William A. Brown 與 Horst W. Huebr 對於文天祥的研究在西方學界具有一定地位，然而卻少見有相關學者在論述中引用兩人的研究成果。

同時，有關文天祥生平的研究，仍能突破之處已十分有限。相反的，關於文天祥死後，從明清至現代，文天祥的事蹟及形象如何被傳播與建立，則是過去學者少有論述的面向。即使如上述萬繩楠等人已在論著中提及這些現象，但對於背景的分析仍然不足。例如這些研究中雖已提及明清時的傳記書寫與祭祀活動，甚

49157/49163/4621567.html（擷取日期：2007/7/13）。2006 年在上海師範大學舉辦之「國際宋史研討會暨中國宋史研究會第十二屆年會」正好適逢文天祥誕辰 770 週年，王曾瑜也在會議論文中再度強調文天祥為民族英雄。見王曾瑜，〈天地有正氣，凜冽萬古存—寫在文天祥誕辰 770 年之際〉，《求是》（2006.11），頁 50-51。

至如萬氏進一步指出這些紀念活動與忠君思想之間的關聯，可惜這些研究多未繼續深究這些書寫與推廣文天祥形象之人的時空背景是否具有特殊性。此外，學者們多半只重分析比較各種文天祥傳記的價值與真實性，而忽略寫作者書寫文天祥傳的年代與背景。又如許多論著都提及明代以後全國各地的文天祥祠紛紛設立，然而文天祥祠的設立究竟是全國性或地區性現象？文天祥祠的設立，除了景仰文氏的忠節與藉文天祥形象加強統治外，是否有其他因素存在？筆者認為這是文天祥相關研究中可以關注與拓展的課題。

最後，近年來學界中關於歷史名人形象之形塑與變化的討論相當熱烈。因此，如岳飛、鄭成功、夏允彝、夏完淳父子乃至於史可法等長期被視為「民族英雄」的人物，他們的形象在近代民族主義發展下產生的轉變，都已有具體的成果出現。學者指出，雖然這些歷史人物所處的時代、生命經歷不同，但他們的形象在近代卻都經過一段類似的變化歷程。⁴⁴因此，同樣擁有「民族英雄」光環的文天祥，其形象的變化是否也與上述「民族英雄」有著相似的過程，應是值得詳加考察與深究的課題。

⁴⁴ 黃克武，〈史可法與近代中國記憶與認同的變遷〉，李國祁教授八秩壽慶論文集編輯小組編，《近代國家的應變與圖新》（台北：唐山出版社，2006），頁 80。